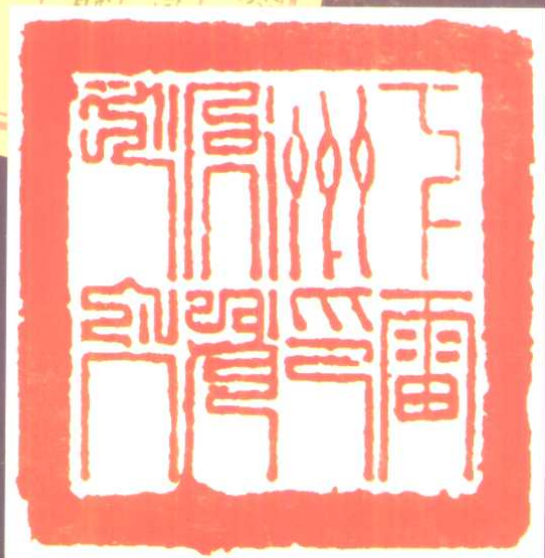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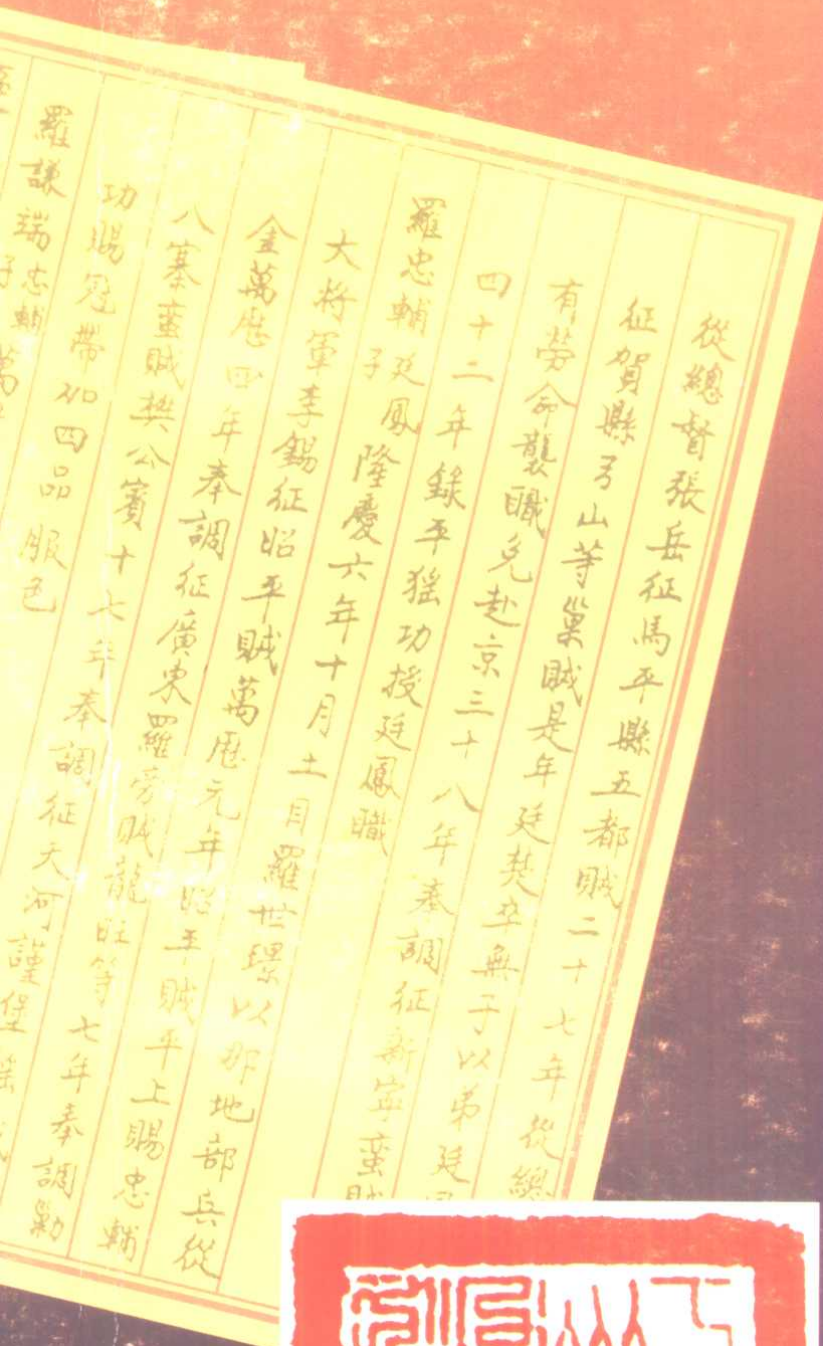


谷口房男
白耀天

编著

壮族土官族谱集成



广西民族出版社

壮族土官族谱集成

谷口房男 白耀天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ZHUANG ZU TU GUAN ZU PU JI CHENG

壮族土官族谱集成

谷口房男 白耀天 编著

责任编辑 覃承勤
封面设计 罗巧贵
技术设计 蓝剑风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南宁市源流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1.12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 册

ISBN 7-5363-3484-2/K·54

定价:45.00 元

目 录

引言	(1)
一 壮族土官族谱概要	(9)
(一) 壮族土官族谱的由来	(11)
(二) 壮族土官族谱的形式和特点	(24)
(三) 壮族土官族谱与壮族的社会历史	(37)
二 壮族土官族谱	(59)
钜鹿宗支南丹知州官谱	(61)
续修忻城莫氏族谱	(105)
泗城《岑氏宗支世系》	(157)
田州岑氏源流谱	(203)
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	(321)
罗阳县黄氏袭官世系	(351)
广南侬氏《亲供宗图》	(367)
恩城州土官族谱	(403)
龙州土官世系	(419)
上下冻州赵氏土官世系	(439)
东兰州韦氏土官世系	(450)
〔附录〕东兰州韦氏土官族属考辨	(477)
思陵州韦氏土官《亲供世系宗支图本》	(506)
太平州历任袭职名衔	(527)
安平州土官《李氏官谱》	(551)

茗盈州土司宗支图	(563)
那地州官族《罗氏宗谱》	(581)
下雷州许氏历代宗谱（内并计祖上功勋）	(609)
 三 壮族土官族谱及其相关资料	(649)
（一）壮族土官族谱之收集	(652)
（二）壮族土官族谱的编纂	(656)
（三）壮族土官族谱之事例	(662)
 〔附录〕壮族土司地方一览表	(669)
 后记	(672)
插图	
忻城县土司衙门	(348)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指令	(400)
南宋“宜州管下羁縻都黎县印”	(548)
“下雷州印“与”永定长官司印”	(606)
“田州土府印”与“迁隆州印”	(648)

引 言

(一)

在我国，壮族是仅次于汉族的一个人口较多的民族，有一千六百万人，主要分布在桂西及滇东南地区。

今日壮族，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是操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壮语与布依语、临高语、傣语及国外越南的依语、老挝的佬语、泰国的泰语、缅甸的掸语、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语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语言〔李方桂等称之为汉语系侗台语族；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归之为南岛语系澳泰语〕，直接承传于我国古代的越语。所以，以汉字记音的颂唱于公元前 528 年的《越人歌》中的词语，大都仍可根据语言的内变对应规律在今壮、傣语中找到其对应的词语（韦庆隐《试论百越民族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其中特别是谓首领、谓王子为“昭”，清代以前壮语如是称（今天等县仍遗有“那昭”地名），今傣语仍如是称。1978 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战国《中山王鼎铭》将后来通写为“吴、越”的二国名写作“吴、雫”（《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7 年第 1 期）。“雫”古读同“于”。《史记》卷 40《楚世家》裴骃《集解》说，“扬越”古也写作“扬雫”。“雫”，“音吁”，“今音越”。这说明“越”古读同“于”音。今日壮族近半的人及布依族仍自称为“布依”，宋、元时傣族及国外部分泰、佬等族被指称为“白衣蛮”，“白衣”（后衍为“百夷”）也当是其自称词。由此可见古越人与今壮、布依、傣等族在其自我称谓上的传承关系。

(二)

壮族居地，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心地区，人口稀少，岭树重遮，热气薰蒸，明时还是个大象出没之所，“鳄鱼夜吼声如雷”之区，草长林密，雨水充沛，高温郁热，病疫流行，自古称为“瘴乡”。中原人谈“瘴”色变，闻“蛮”气馁。迄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西按察使黄性震奏报桂西情况时还说：“粤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瘴疠薰蒸，官斯土者，病亡接踵”（《清圣祖实录》卷124）。这样的自然环境，加上壮族的传统文化与汉族文化属于异型文化，即所谓“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宗元《柳州峒氓》）的“百粤文身地”（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所以唐、宋时代，中央王朝对壮族采取了“姑羁縻之”的政策（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让其首领世袭，“以其故俗”进行治理（张栻《知静江府奏议》，《粤西文载》卷4）。以羁縻制度实行的情况言之，唐代实行的是较为粗疏的政策，“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韩愈《黄家贼事宜状》，《全唐文》卷549）。入宋羁縻制则比较健全，羁縻州洞首领不仅要缴纳粮赋，而且要编练治下丁壮，戍守边防。诚如王安石指出的，“今两江团结系籍丁壮万余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笼州、禄州、古甌峒、罗回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冻州、鹧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则曾经战斗，人人可用，外蛮尝畏之。”（《论邕州事宜》，《王临川集》卷89）由于邕州羁縻溪峒兵强可用，宋朝在利用的同时，也强化了监管措施，如将羁縻州峒分辖于寨，寨之上则为提举，提举之上又设邕管，层层监管，处处设防，犹如“树栅困兽”，使不得随意恣为。元代，由于统治策略的变化，在唐、宋羁縻制的基础上推行了土司制。

(三)

土司制，是元、明、清统治者为了稳定地方、维护一统局面而在还没有完全适应直接统治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间接统治形制。土司制的特点，不是像宋朝那样步步设营、层层关卡，完全将壮族当禽兽看待，而是将壮族土司地区形成独立的政区建置，使其正式成为王朝统一版图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缴粮纳税，清查户口，土官既可作州官县官，也可作为府官路官，又可管理流官州县，比如庆远南丹等处溪峒安抚司就辖有宜山、忻城、河池、思恩、天河等五个流官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持续时间很长，直到本世纪40年代云南省广南县依氏土同知改流，土司制的历史始告结束。

元代，壮族地区有五路一府二司实行土司制，大小土官一百多人。明朝改路（司）为府，并将元代所设的府、州、县、洞、寨进行整顿，设五府、一司、四十州、六长官司、九县、二洞、一寨，存大小六十四个土官。此后或增或改流，迄于民国初年，还有土州二十六，土县四，土巡检十，长官司三，土府同知一，可袭土官四十四人。这些土官，父子传承，世代沿袭，内则伐木塞道，垒石封路，谨守疆土，封闭施治；外则修职贡，听王家征调。他们怎样生活，想些什么，趋向如何？他们上与朝廷、下与土民的臣属或主从关系以及与周邻土官的横向关系，构成了壮族此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和文化发展的机制。设如一些书籍所说，壮族“各属土司等官，籍隶江、浙、山东者居多，本籍次之”（《清高宗实录》卷479），那么壮族的历史该是怎么样的一部历史？

(四)

沈德符说，传闻明初傣族人没有姓氏，其首领请官府给定个姓，当时出镇云南的黔宁王沐氏说：“汝辈无他，唯怕刀剁耳！”

后“即以三字作三姓，不知果否？今夷姓刀者最多，姓怕者唯孟艮御夷府土官一家，其刹姓则未之见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夷姓》）。此虽属污辱性的戏谑，却也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历史真实。泰人在拉码六世（1910~1925）以前有名无姓，中国傣人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仍未普具姓氏，明朝后期轮戍梧州的向武、都康二州的壮族土兵仍“无姓有名”（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5《目兵》）。操壮傣语支各族，其姓氏都是后具的。上述的戏谑或就是本此而演义的。壮族具姓是汉族文化植入的结果。壮族仿汉族取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衡了其人心理的失重，加大了壮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附着力。明、清以后，无论是省志、县志，还是私家所撰的谱系，莫不声言土官们的先人是中原来人，源于中原的著姓望族，因随狄青南征侬智高立功授职方才落籍于桂西的。现在，此风仍频吹不止，大有越吹越劲之势。1988年出版的《壮族通史》肯定了这种说法；近些年壮族中许多姓氏的人不知哪来的劲儿，不断派人上山东、下浙江、奔江西，到中原各地去寻根问祖，声言“五百年前共一家，何况九百余年乎”，千方百计地与中原汉族姓氏网起十八竿打不着的宗亲关系。壮族人中具有姓氏肇于首领人物，后来属下随同首领姓氏，出现了“举洞纯一姓”的历史现象（《文献通考》卷330引《桂海虞衡志》）。如果遵从明、清土官们的说法，今日各姓氏壮族人的声言，他们操说的壮语从何而来？壮族“朝、甫先加老唤公”的命名原则（桑悦《记壮俗六首》，《粤西诗载》卷16）、“十罗九古皆壮村也”的地名特点（民国《桂平县志》卷31）因何而生？唐代柳宗元所咏的“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柳州峒氓），指的是什么人？而明时，“夷俗不知文化近”，“细嚼槟榔血点唇”；“花布抹头是壮老”，“何时弓箭暂离身”；“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男女分行戏打球”，“情歌互答自成亲”（桑悦《趁圩》、《记壮俗六首》，

《粤西诗载》卷16)等等,又是谁家的文化?而且如此一来,壮族作为一个渊源有自的独立的民族群体还有存在的依据吗?

(五)

由于自然的“烟瘴”和人为的“以其故俗治”像两道护膜,将壮族社会包裹得紧紧的,外气入不去,内气出不来,因此过去对壮族土官多是“雾里看花”,隐约其形而不得其真。比如,南丹州首领莫氏,宋时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均说其为“莫大王”,民间也盛有“莫一大王”的传说,但“莫大王”如何个“大王”,民间传说以其人为本演以意象,将“莫一大王”罩在神衣里,“大王”则“大王”矣,而离真实的社会生活太远,不真实。又如,在壮族发展史上,土官从元朝以后踞了六个半世纪之久,壮族地区有多少土官,他们各居何处,是不是壮族,他们相互间以及与朝廷的关系如何,谁曾理个丑寅卯来?再如,不少人爱给历代王朝让土官们“以其故俗治”唱赞歌,谁又理会壮族的大小土官们因此“以故俗治”凭山自大,据险称雄,闭关自守,互为戒备,“土州民既纳国税,又加纳本州赋税;既起调戍广西,又本州时与邻封战争杀戮;土官有庆贺,有罪赎,皆摊土民赔之,稍不如意即没其家;又刑罚不以理法,但随意而行”,倍徙鱼肉,“土民之苦视流民(流官管辖之民)百倍”(明王士性《广志绎》卷5),导致壮族社会的千年一态^①、物质文化的几近荒漠呢?

隐约其形,略得其状,自然难窥历史的真缔。因此,将壮族土官制落到实处,具体壮族历史的内容,详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线索,把握其总体的发展趋势,这是编纂此书的出发点。

^① 清嘉庆年间官镇安知府的赵翼说:“此间民风比江浙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别。”(《粤滇杂记》,《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七帙)

(六)

有人说，假如当年侬智高起兵反宋成功，或没有枢密副使梁适的谏阻和枢密副使狄青的勇于赴任，宋仁宗接受侬智高为“邕、桂七州节度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壮族地区就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局面，建立一个一统的经济市场，壮族就不会是今日的样子了。但是，这只是一个虚拟的假想。固然诗人偏爱于“假如”，说什么“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忧伤”、“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如你用利剑向我猛击”等，使感情激越，美趣横溢，诗味盎然，道出了作者的决心、意志、信念或寄托，引人遐想；可这“假如”却需有生活或思想的逻辑根据，否则就像电视剧上“假如世界上只有孩子”的歌曲一样，直让人觉得可怕，感到唱者、作者愚蠢：没有大人哪有孩子，只有孩子的世界还成什么世界！“只有孩子的世界”，“大海也很乖，老虎也可爱”，“黑夜也不敢来”，人与兽为伍，世道的节律都改变了，这“假如”还有什么可爱、向往、憧憬，激逗人作美的遐想？侬智高青年时代三举进士不第，深受儒家“夷狄”观念的薰陶（张端义《贵耳集》），后其父邕州卫职依存福被广南西路转运使章频“罢遣”，又被交趾李朝囚杀（沈括《梦溪笔谈》卷25），备遭交趾凌辱，他热恋中国，向往宋朝的官职爵位，决不会依附于交趾李朝。当再三求附遭到冷酷的拒绝后，在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的策划下，他以武力求内附，起兵反宋。然而广西诸羁縻州洞首领山水相隔，各自为政，攻劫相矜，“慎独”已久，没有形成共同利益的需求，因此侬智高也只能带领广源州的五千子弟独闯岭南，其他州洞首领则受封于宋，听从余靖的调遣，站在他的对立面。这体现了壮族社会发展的必然。壮族土官诸族谱追源溯流，夤缘攀附于中原汉族名姓望族，同样是体现了壮族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导致了今日的壮族成了这个样子，任

何力量也逆转不了。

(七)

明人刘昌《悬笄琐探·臧谱》载：

袁铉，积学多藏书，然贫不能养，游吴中富家，依栖之。间与之作族谱，穷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王侯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甚信，徐考之，乃多（袁）铉臆作者。

不仅明朝，清代人写起族谱来，也大都如此。比如清人王崇简《谈助·连谱恶习》即说：“凡舆抬皂隶，苟家业千金者，无不与遥遥华胄共相附丽”；“更若远方来宦，一值同姓，鲜不同宗，以致东西南北之人而水木本源千里神合”。社会积习如此，避之甚难，雄材大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几陷于流俗：“帝始与诸臣议修玉牒，欲祖朱文公（朱熹）。一日，见徽州有姓朱者，为典史，问其为文公后乎？其人对曰：‘非也！’帝心顿悟，谓：‘一典史尚不肯祖朱子，而我国家，又可祖乎！’乃却众议”（吕毖《明朝史》小卷1）壮族中有姓氏谱牒，始于明朝，因为那时朝廷规定土官袭替必须递交宗支图本查验，否则不许承袭，其目的就是防止旁人冒袭。清朝中叶以后，壮人姓氏观念逐渐增强，建了宗祠，普遍修撰了族谱。这是仿汉族而来的，因此其谱也传承了汉人修谱的“与遥遥华胄共相附丽”的弊病。这些族谱除了近世的欺人不得外，追源溯流起来则多是穿凿附会之词。本书在疏理各姓氏土官族谱的过程中，依凭史传考其真伪，所据皆史书有征者；而所征引都不厌其烦地详注出处，旨在藉此以传其信。

宋朝人称姓氏谱系为“肉谱”（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9），不清楚其贬褒，但既称之为“肉”谱，即谓其是可以摸得着的，不是宽泛空灵、冥冥漠漠的。不过，这里汇拢收集到的部分壮族诸

姓土官族谱并对之加以评述，不是试图通过努力重组残篇断片来“起死人而肉白骨”，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而是希冀通过他们使壮族历史不再是“雾里看花”，从而明确壮族历史是怎么个样子，其中都有着哪一些人物，他们怎样走过来的，给后人遗留了些什么。

(八)

谷口房男是日本国东洋大学教授，白耀天服务于中国广西民族研究所，本书的编纂是我们认识后产生的共识。居中沟通、斡旋、担任翻译并促成其事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覃义生先生。覃先生拨冗力成其事，可谓为此书的功臣。

书中第二部分选录了十七份壮族土官族谱或世系。这些族谱或世系有莫家、岑家、黄家、侬家、赵家、韦家、李家、罗家、许家等九姓土官。元、明谚云：“思播田、杨，广西岑、黄。”这九姓土官，代表了唐、宋以来壮族中的首领人物。其中，用五号准园体刊印的是各姓氏土官谱系的原文；按语用五号宋体排印，则是编纂者的凭史传而考其真伪；而文中排六号宋体的，俱是引用书文的出处及注释。

壮族土官族谱概要

清朝、民国年间，壮族中的各个姓氏，基本都撰有族谱。而土官的族谱，出现得更早一些。

宗族，是个血缘的人类群体。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成，后来的宗族，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演变发展而来的。“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俊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白虎通义·氏族》）。“族”和“宗”是有区别的，凡血统有关的人统称为族；宗则是于族中奉一人为主，主者死了，就奉其嫡子为继世的主。《诗经·公刘》“君子宗之”，《毛传》认为“为之君者，为之大宗”。《诗经·板》的“大宗维翰”，《传》说“王者，天下之大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续修忻城莫氏族谱》说嘉庆四年（1799年）忻城土官知县莫若恭死后无子，“以际隆之孙、系若俭之子世禧入继大宗”。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南丹州土官知州莫泌死了，无嗣，土官婆彭氏“集众亲族、哨目等公选族中亲贤子弟昭穆相当者承继大宗”，最后以莫溥“禀报继袭，以为大宗之后”（《钜鹿宗支南丹知州官谱》附录4）。这个“大宗”，就是土官族莫氏的“族主”。壮族土官族谱主要记载作为官族中“大宗”的土官的传袭，因此壮族土官族谱实际是壮族“土官宗谱”，也就是壮族土官的“官谱”。

（一）壮族土官族谱的由来

族谱，也称为家谱、宗谱、家乘、支谱、世谱、世系录、总谱、会谱等，是汉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谱之修，尊祖宗，序亲疏，辨隆杀（隆重或简省），右贤德，述贵显，详婚嫁，严生死，尚敦睦”（元李存《舒氏族谱序》，《俟庵集》卷20）。“族谱者，谱其族属崇卑疏戚，使子孙笃尊亲亲之谊，而或以之述门望，显畜聚，表交游者也”（元王礼《夏阳汤氏族谱序》，《麟原后集》卷2）。人们修谱的目的，总括起来，一是“尊祖重本”，明确族姓源流；二是

“敬宗收族”，强化族体的凝聚。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这说明，汉族的族谱出现是很早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选官任官讲郡望、求世系，利之所关，人们尤其热衷于此道，族谱的撰修更其盛行。“唐宗重进士科，士皆怀牒就试，无复流品之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官之选举”不必复由“簿状”了，但是“血缘”的纽带仍把衍于同一个祖先的各个家庭联成一个共同体，“家之婚姻”仍需“谱系”来辨认；作为社会基层细胞的宗族仍需“尊祖重本”，明其族姓的源流；仍需“敬宗收族”，强化其族体的凝聚。因此，唐、宋以后历元、明、清迄于民国，汉族社会中各个姓氏对于族谱的撰修，仍然盛而不衰。姓有族谱，县有县志，族谱于是与府志、州志、县志等，成为中国颇具特色的地方谱志文化。

壮是历史上“越”人的后裔。徐旭生先生说，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越人尚无姓氏（《中国古代的原始时代》〔增订本〕第6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看越国历代君王无余、无壬、无铎、夫谭、元常、句践、颀与、不寿、王翁、王翳、诸咎、错枝、无余之、无颀、无疆等之称，也可知他们没有姓氏可言。壮族的直系先人为秦代居于岭南的瓯骆部落。公元前219年前后，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玕，乃使尉屠睢”率兵统一岭南，发生了秦兵与瓯骆的战争。当时瓯骆的首领为“译吁宋”（《淮南子》卷18《人间训》）。这是越语的汉译音词。“译”，在古汉语里与“败”通假^①，

^① “译”，上古与莫同部，音近。而且，“译”、“择”古音通假，如汉修《尧庙碑》“各相土译居”。《书·吕刑》：“无有择言在身。”《孝经》：“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这三个“择”字实为“败”字，说明在上古汉语里，“译”、“择”又与“败”通假，读同“败”字。